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王金秋 赵敏^{*}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围绕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对象、劳动价值论、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地租理论、世界历史思想以及《资本论》当代价值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观点。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2018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对象等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时,不仅是对相关文本进行解读,而且更加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

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正确理解《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及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关键。卫兴华指出,《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方法,其中历史唯物主义重在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核心思想是要揭示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除此之外,还要重视其他较为具体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以及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关系。^①

许光伟着重强调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他认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根源于“抽象力”理论。由于马克思力求以历史行动统一“理性的抽象力”和“知

^{*} 王金秋,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赵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① 卫兴华:《〈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性的抽象力”，于是产生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分野。马克思方法论的特别涵义在于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工作规范”，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真态”恰恰通过研究对于叙述的工作统帅性得以保证，因此，《资本论》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意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①

郭广迪以唯物史观为例，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因，认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理解资本主义结构和功能时必须借助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并指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能成为影响深远的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陈士聪批判了把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的颠倒理解为旧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颠倒的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并非片面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继承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不是继承了旧唯物史观的观点，而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探讨颠倒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感性实践基础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与旧唯物主义的结合，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资本”辩证法。^③

孙夺认为，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解决在中国这样生产力原本不够发达的国家如何走通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④

张旭通过回顾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形成，以及研究对象的提法在《资本论》中进一步的精确化。同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应该也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应该继续以马克思的方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概括和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科学、持续的理论支撑。^⑤

赵磊指出，对《资本论》方法论的误读导致学界种种混乱的存在，强调了正确理解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性。他指出，不懂《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价

① 许光伟：《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② 郭广迪：《学者眼中马克思的学术态度与研究方法》，《经济纵横》2018年第5期。

③ 陈士聪：《马克思是否“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基于〈资本论〉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孙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及当代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⑤ 张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经济纵横》2018年第5期。

值转形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被误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证伪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经济学虽然崇尚“实证”精神，但其唯心史观的方法论阻碍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但唯物主义者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一个直接运用是关于《资本论》的起点范畴问题的探讨。张璠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出发，认为《资本论》开篇中“商品”可以表现为分析对象、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分析起点，而表现为不同“对象”“起点”的商品却并不是同一性质的“商品”。对资本主义商品的分析过程，是从简单商品或商品一般出发，到资本主义商品一般的思维过程，即“具体→抽象→思想具体”的思维过程。借以实现分析对象、逻辑起点、历史起点与分析起点的统一。^②

魏旭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出发，指出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不是两个独立的、截然分开的阶段或方式，而是同一研究进程中交互运用的方法。《资本论》的整个逻辑过程是：从具有最丰富规定的世界市场的商品出发，抽象出商品一般，以此为逻辑起点，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最后又回到充满丰富规定的世界市场的作为资本的产品的商品这一逻辑终点，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③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在国内外理论研究中存在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是如何理解作为研究对象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张作云通过梳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产生过程，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结合方式或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生产方式及其变化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推动作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从总体上来理解的生产关系。^④

田超伟和卫兴华认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方式；马克思在

① 赵磊：《“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意蕴——基于〈资本论〉的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② 张璠：《〈资本论〉的起点：分析与澄清》，《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魏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经济纵横》2018年第2期。

④ 张作云：《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及其当代意义》，《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不是主张把“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恩格斯、列宁也都没有把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起来作为研究对象。^①

除此之外，肖磊还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论证。他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设想、苏联模式及中国道路的超越三个方面阐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科学性，认为不能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为“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将“生产力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进一步解释为“事后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主张事前意义上的“多元决定论”。^②

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2018年，学者们除了对价值转形、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间关系等经典的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问题进行研究之外，还针对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新现象如新媒体的广泛普及所产生的数字劳动等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范围。

首先，许多学者围绕价值转形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在转形问题是否存在方面，魏峰对于冯金华提出的价值转形是伪命题的命题进行了分析。她从均衡、投入转形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阐明冯金华“转形伪命题”体系中存在的方法上的困难，“转形伪命题”证伪的只是再生产均衡条件下的转形命题和投入转形命题，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本身并没有被证伪。^③

在转形问题的假设条件方面，以往对于转形问题应具备什么样的假设条件、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假设条件的研究甚少。赵锦辉总结了学者们修改转形假设条件的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添加假设条件，重点是将简单再生产纳入假设条件；第二类是修改假设条件，重点是区分价值与价格，并认为这些修改是导致转形解法存在种种争论的主要原因。继此，他提出五部门模型推广到n部门模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假设绝对地租

① 田超伟、卫兴华：《再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与陈伯庚教授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② 肖磊：《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若干理论问题——基于经典文本的解释、辩护和重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魏峰：《均衡与投入转形：再论价值转形问题的真伪》，《经济学家》2018年第6期。

是生产价格的一部分，假设股份资本参加利润率平均化过程。^①

在转形问题的具体解法方面，陈咏、荣兆梓在马克思已有理论基础上，通过添加生产的物质消耗矩阵和净产品生产价格总量偏离其价值总量两个关键节点，用总剩余价值率不变取代剩余价值总量不变，构建广义转形数理模型，完成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数理推导。^②

孟捷进一步发展了“新解释”所提出的进路：第一，利用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将此进路推广到总产品；第二，强调转形不必局限于均衡条件，在再生产失衡的前提下，同样存在价值转形；第三，结合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对转形所需服从的总量一致命题做出新阐释。得出转形不仅是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在考虑非均衡和市场价值概念的前提下，也是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向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形的结论。^③

弗雷德·莫斯利从“宏观货币解释”（MMI）观点出发解释转形问题。他认为第三卷中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投入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提前预付货币资本的同一实际数量，也是第一卷马克思的总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投入。马克思理论中并不存在具有两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两个体系”——一个“价值体系”和一个“价格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理论中不存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转形”。大卫·莱伯曼对弗雷德·莫斯利《货币与总体》一书涉及的转形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认为 MMI 本质上是自相矛盾和不连贯的，不能作为马克思转形问题的解释。一方面，MMI 转形的逻辑结果是走向古典、标准的斯拉法体系；另一方面，总价格=总价值和总利润=总剩余价值问题依然存在。^④

陈经纬和姜能鹏通过构建价值转形流程的结构模型、关系模型和动态价值转形模型，将以往对转形问题的研究纳入到动态转形框架中，并通过对中国 1998—2009 年期间产业结构数据进行考量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现象完全符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逻辑，也为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等经济规律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⑤

① 赵锦辉：《转形问题假设条件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陈咏、荣兆梓：《循着马克思的路径完成马克思的工作——价值转形理论再探》，《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③ 孟捷：《从“新解释”到价值转形的一般理论》，《世界经济》2018 年第 5 期。

④ 大卫·莱伯曼：《货币与总体：关于价值形成和转形的又一轮争论》，《经济纵横》2018 年第 5 期。

⑤ 陈经纬、姜能鹏：《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生命力体现与实践品格——来自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数据考量》，《金融评论》2018 年第 6 期。

2018年,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再单纯从数理模型角度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和论证,而是更加注重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进行解读和探讨。魏旭认为,价值转形不仅是一个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逻辑过程,而且是一个包含社会生产发展演化的价值转形条件生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价值转形逻辑过程的分析是借助具有历史规定的中介范畴如市场价值、资本及其构成以及生产方式演化等完成的。^①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以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主导形态的经济时代,价值源泉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种项谭梳理了学界关于“什么创造价值”“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等关于价值源泉的争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价值本质是劳动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相互交换的劳动”创造价值;承认商业劳动创造价值并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则;劳动并非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平行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②

范瑞滨批驳了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泛化的现象,通过对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各种非生产劳动特点进行分析,指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泛化劳动价值论不是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而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③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兴起的“数字劳动”理论也成为价值源泉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包括与数字信息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相应地,这一理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一些非传统的物质劳动例如互联网用户的“免费劳动”是否成为价值的源泉。周延云和杜晓芬认为,数字劳动过程是一种价值增殖加剧的过程,社交网站在激发和发挥人们合作潜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对用户隐私的监控及对用户劳动剥削等问题。^④

杨嫚认为,新媒体产消者及其劳动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框架,新媒体产消者劳动被资本吸纳的过程是一种更为精细、复杂的资本再生产方式。^⑤

夏玉凡认为,把互联网用户行为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忽略了生产数据商品的生

① 魏旭:《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再研究——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统一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

② 种项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于对价值源泉争论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③ 范瑞滨:《论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5期。

④ 周延云、杜晓芬:《数字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及其实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5日。

⑤ 杨嫚:《论新媒体产消者“自由劳动”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产性劳动，忽略了互联网产业背后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行为，错误地理解了数据产业生产方式和互联网中的生产性劳动。^①

最后，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社会的新发展也是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应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以更具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增强这一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冯金华在马克思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加入时期分析得出，在任意一个时期，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价格 GDP 恰好等于这一时期以当年价值计算的名义价值 GDP 除以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以任意基期价格计算的 actual 价格 GDP 恰好等于以同样基期价值计算的 actual 价值 GDP 除以基期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以任意基期价格计算的 actual 价格 GDP 增长率恰好等于以同样基期价值计算的 actual 价值 GDP 增长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 GDP 概念，试图建立劳动价值论与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价值总量之谜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②

钱津认为《资本论》是将所有的复杂劳动统统还原为简单劳动，没有对复杂劳动展开专门的研究。而社会的发展是由劳动的发展推动的，更准确地讲是由复杂劳动的发展推动的，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更深入地进行复杂劳动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创新需要建立新的复杂劳动理论。^③

王琳、刘诚洁将健康因素引入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构建了健康劳动力价值理论。指出健康损害赔偿的实质是对现实劳动力价值与健康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进行补偿，目前我国健康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力度仍不足，应从减少健康损害、保障累积性和即时性健康损害赔偿、提升未来性健康损害赔偿三方面着手改进。^④

然而对于这些创新的努力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一脉相承，仍然存在争论。李松龄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是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二是需要改善和拓展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但拓展劳动价值论不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概念，或是提出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理论和概念。^⑤

① 夏玉凡：《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劳动理论——以福克斯劳动观为中心的批判性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冯金华：《劳动、价值和增长：对“价值总量之谜”的一项研究》，《世界经济》2018年第2期。

③ 钱津：《生产劳动与复杂劳动研究》，《经济纵横》2018年第5期。

④ 王琳、刘诚洁：《健康损害赔偿的理论界定与现实对策研究——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的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⑤ 李松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经济问题》2018年第9期。

三、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及经验的研究

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2018年,国内相关学者一方面继续关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逻辑、成立条件等传统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利润率测度方法、范围的调整,继续加强对一般利润率下降问题的经验研究。

关于利润率平均化的方法,李亚伟认为利润率平均化的难点在于调整利润率的度量。在批判继承谢克、杜梅尼尔和列维等学者的调整方法基础上,其建立了产能利用率、折旧、税收、工资和价格指数变动的调整利润率度量方式。并以美国制造业为例,通过考察调整利润率平均化状况,发现制造业各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没有表现出平均化的迹象,各部门的调整利润率却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势;调整利润率平均化的方式,不是收敛于均值,而是围绕着均值不断地波动。^①

自置盐定理提出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争论的焦点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否会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上。孙小雨认为置盐定理和马克思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并不矛盾,它只是表明在特定的假设下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抵消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从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上升。通过放松置盐定理特殊的限定条件,在比较谢克的真实竞争理论与孟捷和冯金华的模型基础上,其建立了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化更一般的框架。^②

李翀根据美国1948—2015年的实际经济数据证明,虽然一般利润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趋向下降,但是一般利润率不是必然趋向下降的。另外,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起着反向作用,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在正向上对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起着更大的作用。^③

王智强基于经验数据分析得出,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利润率有正效应,其与剩余价值率的正效应大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负效应,利润率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剩余价值国际转移导致利润率下降规律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造成的限制存在国际差异。^④

① 李亚伟:《利润率平均化:量度模型与经验考察》,《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② 孙小雨:《真实竞争和利润率下降:真实竞争理论与MF模型的比较》,《世界经济》2018年第3期。

③ 李翀:《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辨析与验证》,《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④ 王智强:《剩余价值国际转移与一般利润率变动:41个国家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8年第11期。

汪波等从技术创新角度，以劳动者劳动创造“新增价值”为基础，详细分析了新增价值指数、劳动力价值、新增价值和利润等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分别考察了危机期、萧条期、复苏期、高涨期以及衰退期的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和界定范围，得出结论：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都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①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资本收益率高企且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观点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存在矛盾，如何看待这两种结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桑朝阳和马可通过对皮凯蒂资本概念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高企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并不矛盾，皮凯蒂将全社会的财富的货币额作为资本的统计基础，比马克思资本范畴中的不变资本部分更宽泛，但不包括可变资本部分。因而，皮凯蒂统计意义上的资本收益率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小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利润率转变为大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的观点并不正确。此外，皮凯蒂关于资本收益率基本稳定不变的经验统计结果，也证明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正确性。^②

四、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对两大部类的划分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主要起点。2018年，学术界内依然是主要基于两大部类的划分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重点集中在经验研究方面，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创新较少。

朱鹏华和王天义从理论的萌芽、理论的形成和理论的基本完成三段脉络总结了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作历程，指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创作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个创作完成的经济学理论。同时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需要继承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批判精神和认真态度进行创新发展。^③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一个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存在持续争论的重要问题。罗

① 汪波、李朝前、刘楠：《基于技术创新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研究》，《金融评论》2018年第10期。

② 桑朝阳、马可：《资本收益率高企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皮凯蒂对马克思理论的经验证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③ 朱鹏华、王天义：《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

丹、张国胜认为，该规律由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决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二战后美国的历史经济数据表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确存在，以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每年的产值以及产值增长率之差等两个指标衡量的生产资料生产获得了优先增长。由于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是实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技术基础，政府改革措施与投资政策是实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关键因素。^①

陶为群运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公式基础上，将两大部类自动平衡增长的特性作为寻求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最优增长路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增长率是两个部类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因而，只有当生产资料部类获得最高增长率，才能够形成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最高（最优）增长率。其次，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最高增长率必定是平衡增长率。另外，要使生产资料部类获得最高增长率，就必须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②

赵峰等从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的结构角度，构建一个包含固定资本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的框架，并运用1990—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三部类的增长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固定资本部类的增长快于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固定资本需求比流动不变资本更大；在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消费资料部类的盈利能力持续高于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部类，成为推动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逐渐显示出了带动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和固定资本部类增长的潜力。^③

王艺明、刘一鸣认为，既有基于两大部类和扩大再生产公式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在利润率平均化、两大部类劳动生产力提高机制、固定资产投入等问题上存在未解决的争议，他们通过解决这些理论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结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推导得到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公式，并应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中的重要假设和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支持劳动者实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比例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生产资料数量同比

① 罗丹、张国胜：《论工业化后期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为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② 陶为群：《两大部类自动平衡增长的特性和最优增长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③ 赵峰、赵奕菡、李帮喜：《固定资本、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工业化——基于三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结构分析》，《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

例增长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等模型设定。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而用市场价格计算的一般利润率在多数时间保持相对稳定。^①

贺娜基于“整体观”和“结构观”两个视角总结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分析了两种扩大再生产视角下的产业演进路径和结构失衡形态。基于“整体观”视角的扩大再生产，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以剩余价值增量追加来实现规模扩大。基于“结构观”视角的扩大再生产引致了“失衡性”产业演进。^②

五、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

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2018年是200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十周年，许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上，强调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出发分析周期性危机的根源。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另一方面，对金融危机的具体产生机制、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后的经济现实运动等问题稍有忽视。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的长期波动，学界已经形成众多各有特色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对既有的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进行系统综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出新的阐述。高峰总结了以熊彼特、曼德尔、戈登等人为代表的长波理论，三种理论并非互相排斥关系，而是互相补充。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应当被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投资动力、投资的物质基础、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及市场需求四个条件决定投资率长期变化。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7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制度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推动下，虽然经历了一次新的扩张长波，但是，这次扩张长波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具有弱势化的特征。正是因为此次长波的特征及其所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尖锐化，决定了2008—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非一次单纯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或一般的金融危机，而是一次形成长波转折点、开启萧条长波阶段的结构性

① 王艺明、刘一鸣：《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② 贺娜：《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视阈下的产业演进与结构失衡》，《经济纵横》2018年第6期。

大危机。^①

王中保、程恩富指出，由于没有定量界定的经济危机概念容易被经济周期、经济波动中的“收缩”概念所掩饰，经济危机容易被误看成是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现象。当经济运行收缩阶段出现严重相对过剩或普遍相对过剩，或者说出现连续负增长，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而包括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固定资本的更新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等在内的经济危机多重理论阐释，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外围理论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阐释，与内核理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资本家的贪婪、政府的监管不力、虚拟金融的过度发展、信贷消费过度、经济金融风险低估、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危机的诱因，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枝节或节点，并与内核和外围理论一起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②

对经济危机的考察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付文军和卢江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忽略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维度”，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生而俱有的“顽疾”，是一个介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和流通、供给与需求、资本及其逻辑之间的范畴。只有遵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维和方法，才能全面厘清经济危机的现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也才能号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③

在危机产生的原因方面，赵建强调了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性。连续性产生于大规模的协作、分工与机器生产，是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当生产连续性遭到破坏，经济体就会出现生产失调、流通困难、信用中断等现象，经济危机是最突出的表现。^④

此外，李枫、李济广着重分析了经济周期与物价的关系。货币流通和伴随着危机的物价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危机的最表面的现象，而资本主义生产中各种

① 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② 王中保、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

③ 付文军、卢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逻辑与价值——基于经典文本的新思考》，《江汉论坛》2018年第6期。

④ 赵建：《马克思论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性——基于〈资本论〉的理解》，《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

因素的矛盾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而也是物价变动的根源。剩余价值追求所造成的生产盲目扩大与劳动人民消费能力不足，以及信用过度发展和政策扩张的推波助澜，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周期循环。在经济高涨时期，投资快速增加，对投资品的需求极大提高，带动投资品价格上涨；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需求增加，从而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也会多少增加一些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消费品价格上涨。^①

六、关于地租理论的研究

地租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农村土地改革、城市住房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都以地租理论为基础。2018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既对传统的理论焦点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也结合中国的现实对土地所有权、城市地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围绕“虚假的社会价值适用范围”的争论被称为“范围之争”，曾永寿对这一争论的含义、来源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析。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考察，曾永寿认为马克思明确阐述了级差地租是“虚假的社会价值”，认为对于该概念的内涵不该有歧义。蔡继明所谓的“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价值理论的误解，难以成立，而且，其所提出的破解矛盾的方案也不正确。^②

基于马克思对地租及土地所有权的相关理论，陈晓枫认为，土地财产权虽然表现为一种法律关系，但其实质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产权理论区别于其他产权理论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既分析了各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也阐明了各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土地权能统一与分离的不同状况，揭示了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到土地私有制再到高级的土地公有制的不断扬弃和发展过程，土地产权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远比原始土地公有制高级、发达，能够适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要求。^③

① 李枫、李济广：《物价收缩的再探讨：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② 曾永寿：《虚假的社会价值论争评析》，《经济问题》2018年第1期。

③ 陈晓枫：《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2期。

李朋对恩格斯晚年的农业合作化思想进行了总结。社会化大生产在农业领域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条规律，是激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在尊重农民财产关系、保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通过组建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帮助农民走向社会主义。^①

对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当代意义，邓元东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分析中国城市房地产经济现象，揭示背后城市房地产价格形成的经济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由生产过程中凝结的抽象劳动和地租资本化的加总决定；房地产价格可转化为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城市地租的购买价格三个部分，其中城市级差地租决定了房价趋势的形成；同时在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中，级差地租受单个城市规模的限制给城市房价设定了一个运行区间。稳定房价需拉平城市房地产区位差异并对土地价值增值部分进行收入再分配。^②

七、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总结和实践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成为2018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

宋国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从世界历史的建构原理、形成机制、演化策略、价值取向以及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实现等方面，梳理、总结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并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③

同样基于马克思经典著作，杨昊认为，马克思对既有世界主义思想的批判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方面，从理论上揭露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经济世界主义的伪善性，以及受到这一生产方式基础制约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软弱性；另一方面，批判了在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的，以世界主义之名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之实

① 李朋：《恩格斯晚年合作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3期。

② 邓元东：《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中国城市房价形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6期。

③ 宋国栋：《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的外交实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沿着两条相互联系的线索提出了世界历史思想：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普遍性质的分析；其二，关照人类实践，表现在通过革命的国际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之中。^①

除了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梳理、解读外，韩海涛、李珍珍在当代视阈下，对马克思世界理论的三重意蕴进行了总结。就生成意蕴而言，世界历史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生产并转变；就主体意蕴而言，世界历史主体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向；就实践意蕴而言，世界历史的发展在现实批判中确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三重意蕴对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世界历史转变具有重大意义。^②

郝戈深入挖掘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指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③

杨圣明和王茜通过探析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梳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阐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思想的理解，认为该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原因、规律与作用，是对全球化的预见和前瞻性认识，对人们认识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自由化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④

八、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70周年，《宣言》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2018年，学界从对《宣言》的介绍及当代意义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蒲国良系统梳理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七篇序言在内的数量庞大的《宣言》序言和

① 杨昊：《批判与革新：马克思世界主义思想初探》，《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

② 韩海涛、李珍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三重意蕴》，《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③ 郝戈：《〈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④ 杨圣明、王茜：《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兼论“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导言系列。指出《宣言》序言和导言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应受到学界关注。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宣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都将大有裨益。^①

张双利指出，《宣言》的核心内容是从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历史性批判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为核心线索，明确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原则性批判以私有财产的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为核心线索，具体揭示了自由的原则何以在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必然走向它的反面。^②

吴日明认为，《宣言》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宣告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批判，从发展目的、发展状态、发展道路三个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弊端。在科学的批判中，《宣言》展现了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科学发展思想。^③

林宇晖和刘爱莲阐释了《宣言》中的共享理念。《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意在构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所有人通过自由劳动“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发展状态。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历史进程中，无产者共同劳动的经验事实遮蔽了劳动的共享属性，资产阶级私有制加剧了“虚假共享”的社会现实，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未能解蔽资产阶级的虚假共享。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过程中，解蔽了科学共享的认识“枷锁”。^④

赵馨姝和李传兵系统阐述了《宣言》中全球化思想的形成以及相关内涵，指出充分吸收和借鉴《宣言》的全球化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⑤

林密和陈铮探索了《宣言》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指出深刻把握我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的社会历史成因与克服路径，不能局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

① 蒲国良：《〈共产党宣言〉序言/导言研究简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

② 张双利：《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③ 吴日明：《深刻理解〈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发展思想》，《新华日报》2018年5月15日。

④ 林宇晖、刘爱莲：《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享思想的遮蔽与解蔽——关于〈共产党宣言〉中的若干共享问题解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⑤ 赵馨姝、李传兵：《〈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月刊》2018年第11期。

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析，而应当将其置入资本主义及其以不平衡地理发展方式驱动并加速的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历史语境中。^①

胡钧和施九青认为《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宣言》和《资本论》等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②

项久雨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条逻辑主线阐释《宣言》的中国意义。从历史逻辑看，《宣言》在世界历史的深层呼唤中出场，其传入时中国正处于中国人民走向觉醒与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历史时刻。从理论逻辑看，《宣言》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发展演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实践的定位、立场与《宣言》是一致的、连贯的，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与伟大梦想的实现都需要《宣言》的在场。在《宣言》的指引下，中国实践方能不忘初心，继续创造奇迹。^③

九、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手稿的研究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中央编译局于 2018 年 5 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 14 部著作的单行本或节选本，还有一部专题选编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④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强调继续深入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挖掘手稿的理论价值。G. 胡布曼一方面介绍了 MEGA 的出版历史、MEGA 与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和各种版本的差别、MEGA 的国际性特征和国际性影响等；另一方面，介绍了 MEGA 编辑出版工作的最新成果，如已经完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笔记等，并对 MEGA 第 3、第 4 部分未来的电子化出版方

① 林密、陈铮：《〈共产党宣言〉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从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谈起》，《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 7 期。

② 胡钧、施九青：《〈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经济纵横》2018 年第 8 期。

③ 项久雨：《〈共产党宣言〉的中国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④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

案作了详细说明。^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²）较之于其他类型版本，是“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其全部著述，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因而其研究内容一直备受学界关注。C. -E. 福尔格拉夫详细介绍了MEGA²第2部分第4卷第3册正文部分和资料部分的编辑工作，阐述了该卷次中马克思《资本论》第2册及第3册手稿的产生时间、编排顺序、手稿的日期确定、创作构想、概念使用、方法论等问题，并选取“斯密摘录”、“价值公式”和“级差地租”等内容较为重要的几份文稿进行了详细分析。^②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希罗科拉德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介绍了俄罗斯关于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情况。^③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学者已经对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俄国的民粹主义者第一次翻译出了《资本论》的俄文版，这是唯一一版有马克思本人参与翻译的俄文版本，也是第一本非德语的《资本论》。1920年以后的苏联时期被认为是苏联经济思想的黄金时期。苏联政府为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一步推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思想，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机构和社会学领域的机构、组织。尤其是由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梁赞诺夫先生担任院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学院，做了大量有关马克思的手稿编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

张钟朴介绍了马克思为《资本论》第3卷所写手稿的总体情况，以及恩格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编辑发表《资本论》第3卷的经过。^④1864—1865年，马克思写下《资本论》第3册“主要手稿”，这部手稿成了《资本论》第3卷的基础。1867—1882年间，手稿的写作分为两个时期：1867—1870年，马克思共为第3册写了10份片断手稿；1870—1882年，马克思为第3册写了6份片断手稿。恩格斯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第3册“主要手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片断手稿、补写部分内容、调整章节

① G. 胡布曼：《整体性的马克思：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新构想与完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② C. -E. 福尔格拉夫：《MEGA²第2部分第4卷第3册中的马克思1867—1868年〈资本论〉第2册和第3册手稿》（上、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4、5期。

③ 李琼、王金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纵横》2018年第6期。

④ 张钟朴：《马克思晚年留下的〈资本论〉第3册手稿和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3卷的工作——〈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之八》，《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划分，历时 11 年多，终于编成了《资本论》第 3 卷。

黄力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问题，即经典作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表述存在不尽一致地方等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了分析。^① 认为应该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一方面，承认经典作家存在思想差异是正常的而非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自我否定也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无进步者才固守原有思想。另一方面，即使在经典著作文本的差异性思想中出现堪称颠覆性的内容，也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承认其思想史意义，又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十、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介绍及当代价值研究

在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与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十分必要的。胡世祯指出，我国学术界由于长期忽视对《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以至于出现了诸多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误读与误解，特别是见诸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货币与纸币的关系、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关系、年剩余价值率与年利润率的关系以及创造价值的劳动与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关系等，亟须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学习与研究进行辨正。^②

李连波总结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资本论》研究的三个方面：一是结合资本主义现实演进，从现象学、地理学、媒介和传播等角度重新解释《资本论》，增强《资本论》的现实解释力；二是反思《资本论》理论、方法和逻辑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挖掘《资本论》中蕴含的深刻思想；三是继承并发展《资本论》，为反抗资本主义和走向未来提供指引。这些系统梳理对于国内《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③

李成勋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和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理论，充分揭露了

① 黄力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8 期。

② 胡世祯：《认真学习与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经济研究》2018 年第 7 期。

③ 李连波：《重释、反思和超越：150 年后再读〈资本论〉》，《国外理论动态》2018 年第 6 期。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①《资本论》不仅给了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其发展的理论武器、追求未来社会的伟大理想，而且给了我们研究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还给了我们无畏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和高尚的友谊典范。

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众多学者强调了《资本论》的当代意义。^②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指出，马克思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资本论》的理论不仅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涉及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资本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大学杨志强调了《资本论》本身以及在当代的重大价值。从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列宁时代提出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到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到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的人都是一定历史进程、社会关系、制度构建、文化引领、生态环境中的具体的人。但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必须要在以互联网科学技术为基础、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背景下，否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设想将陷入唐吉珂德式的幻想。

总的来说，2018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思马克思基本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试图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思想；二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从不同视角进行当代解读，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三是强调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在当代的旺盛生命力，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现实需求。在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方面，基于当代世界的新发展尤其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文本、重新思考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仍然是主要方向。

① 李成勋：《〈资本论〉给了我们什么？》，《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② 李琼、赵敏：《加强对〈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综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4期。